

17575

K 879.2
/



佛教石窟考古概要

国家文物局教育处 编



文物出版社

前 言

1988年7~9月,国家文物局委托大同市文化局和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举办了第一届石窟考古培训班。参加该班学习的有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四川、广西等石窟研究和保护单位的近三十名同志。

培训班的课程与授课工作,是由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大学考古系汉唐考古教研室一起商定的。宿白教授对培训班的筹办与教学安排,提供了指导性意见,并专门讲授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导论。马世长和丁明夷两位先生主持了全部教学工作。

培训班的课程,是按正规教学要求进行的。每天上午和下午授课,晚上复习和辅导。每门课程结束后,进行严格考试。最后进行了为时三周的石窟测绘与记录的实习。通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学员们不仅在佛教考古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方面有较大提高,而且基本掌握了石窟寺管理、保护、研究的操作规程与方法。

培训修班安排的课程有:中国佛教简史;印度、中亚佛教考古;中国石窟考古;石窟考古测量和石窟测绘与记录实习。以上课程内容是从从事石窟考古工作所应具备的基础知识。考虑到当前尚缺少这方面较系统的参考教材,我们将培训班的授课讲稿编辑出版,以供从事石窟工作的同志参考。本书讲稿,由于讲课人授课后忙于各自的工作,未能全面增补修改。授课时使用的大量幻灯片也因客观困难,无法收入本书。书中的不是和疏漏,只能以后设法弥补。收入书中的中国石窟考古部分,是根据讲课录音整理的。参加记录、整理工作的有李雪芹、赵曙光、李崇峰、李裕群、常青、张总等同志。克孜尔石窟和南朝石窟部分,分别由马世长和李裕群补写。

各课授课与撰稿情况如下:

第一编 中国:马世长 丁明夷 许宛音

第二编 印度与中亚:晁华山

第三编 中国佛教史:业露华 李崇峰

第四编 石窟寺考古测量:王树林

参加教学辅导工作的同志有李崇峰、李裕群和邢军。

第一届石窟考古培训班的教学工作,得到有关单位和诸位先生的支持,本书的编辑工作也同样得到他们的通力合作。文物出版社的同志对全书的编排与加工,付出辛勤

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家文物局教育处

1992年1月15日

目 录

前 言

第一编 中 国

一、中国石窟寺考古	(3)
二、新疆地区石窟概述	(7)
拜城克孜尔石窟	(7)
三、陕甘宁地区石窟概述	(34)
第一章 河西早期石窟	(34)
第二章 敦煌莫高窟	(46)
第三章 麦积山北朝石窟	(79)
第四章 须弥山石窟	(90)
第五章 延安石窟	(98)
四、华北与中原地区石窟概述	(102)
第一章 云冈石窟	(102)
第二章 龙门、巩县、天龙山、响堂山和安阳石窟	(125)
五、南方地区石窟概述	(145)
第一章 长江中下游南朝石窟	(145)
第二章 四川各地石窟	(150)
第三章 杭州飞来峰石窟	(162)

第二编 印度与中亚

一、印度佛教建筑与造像	(167)
第一章 概述	(167)
第二章 佛教的起源	(170)
第三章 早期佛教建筑与浮雕	(177)
第四章 佛像的产生	(203)
第五章 佛教的兴盛	(214)

第六章 密教的寺院与造像·····	(235)
二、中亚佛教建筑与造像·····	(245)
第一章 概述·····	(245)
第二章 犍陀罗佛寺与造像·····	(248)
第三章 巴米杨石窟·····	(263)
第四章 克什米尔的佛教岩画与题记·····	(287)
第五章 阿姆河以北的佛教遗址·····	(294)

第三编 中国佛教史

一、中国佛教简史·····	(315)
第一章 绪论·····	(315)
第二章 中国佛教输入时期(1、2世纪)·····	(323)
第三章 佛经翻译时期(3~5世纪)·····	(331)
第四章 义学发展时期(5~6世纪)·····	(344)
第五章 创宗立说时期(6~9世纪)·····	(362)
第六章 融合吸收时期(10世纪以后)·····	(390)
第七章 近代佛教的复兴·····	(406)
二、有关中国佛教考古的西文书籍介绍·····	(415)

第四编 石窟寺考古测量

石窟寺考古测量·····	(445)
第一章 怎样测量洞窟方位·····	(445)
第二章 怎样测绘洞窟平面图·····	(456)
第三章 近景立体摄影测量在石窟寺考古工作中的运用·····	(486)

第一编

中国

一、中国石窟寺考古

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我们简称为石窟。许多石窟寺洞窟密集，故常有千佛洞之称。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

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大都见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20世纪初，一些外国人即根据上述著录调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如日本人伊东忠太调查山西大同云冈石窟(1902年)，法国人E.É.沙畹调查洛阳龙门石窟(1907年)。不少外国人的调查，往往伴随着掠夺和破坏，德国人A.von勒科克在新疆拜城、库车、吐鲁番诸石窟盗掘遗物、剥离壁画(1904~1914年)；英国人A.斯坦因(1907年、1914年)、法国人伯希和(1908年)和日本大谷考察队(1911~1914年)等对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重要文书和工艺品的骗取劫夺；日本人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1923年)和美国人对龙门石窟(1934年)的肢解石雕、凿毁造像等，是最突出的几起。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组织的云冈调查班，对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8年之久(1938~1945年)。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30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1935年北平研究院记录响堂山石窟。40年代不少学者和美术机构注意了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境内的石窟，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的调查、实测和临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石窟遗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对现存石窟都开展了调查和记录工作，重新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龕。自50年代以来，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逐渐展开：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分期；发掘了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为恢复某些石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对石窟组合关系的探索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中国的石窟可分7类：①窟内立中心塔柱的塔庙窟；②无中心塔柱的佛殿窟；③主要为僧人生活起居和禅行的僧房窟；④塔庙窟和佛殿窟中雕塑大佛像的大像窟；⑤佛殿窟内设坛置像的佛坛窟；⑥僧房窟中专为禅行的小型禅窟(罗汉窟)；⑦小型禅窟成组的禅窟群。根据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又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4个大地区。

新疆地区 分布在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集中的地点有3区：①古龟兹区。在今库车、拜城一带。主要石窟有拜城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库车境内的克孜尔

尕哈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塞姆石窟。其中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开凿最早,大约开凿于3世纪,4~5世纪是其盛期,最晚的洞窟大约属于8世纪。其他3处,开凿的时间都比克孜尔晚,衰落的时间可能迟到11世纪。②古焉耆区。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七格星一带,开凿时间约在5世纪以后。③古高昌区。在今吐鲁番附近。主要石窟有吐峪沟石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早期石窟约开凿在5世纪,柏孜克里克主要石窟是9世纪以后回鹘高昌时期的遗迹,最晚的洞窟有可能迟到13世纪。

新疆石窟多塔庙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以及不同形制洞窟组成的洞窟组合,也有少量的禅窟群。5世纪以后,方形佛殿窟数量增多,出现了佛坛窟。焉耆、吐鲁番一带还有洞窟前面接砌土坯前堂和运用土坯砌建的洞窟。这些不同形制的洞窟,除一般僧房窟外,窟内都绘壁画,绝大部分原来还置有塑像。绘塑内容,6世纪以前,主要有释迦、交脚弥勒和表现释迦的本生、佛传、因缘等图像。6世纪出现了千佛。8世纪以来,中原北方地区盛行的阿弥陀和阿弥陀净土以及其他净土,还有一些密教形象,都逐渐传播到这里,壁画布局和绘画技法也较显著地受到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

中原北方地区 指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以迄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多,内容复杂,是中国石窟遗迹中的主要部分。可细分为4区:

①河西区。甘肃黄河以西各县沿南山的地段,大都分布有数量不等的石窟。其中敦煌莫高窟延续时间长、洞窟数量多。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5世纪,陆续兴建到14世纪。莫高窟以东的重要石窟有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这几处石窟除榆林窟外,都还保存5~6世纪的遗迹。武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历史上有名的凉州石窟的遗迹。

②甘宁黄河以东区。主要石窟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固原、庆阳石窟始凿于6世纪;永靖、天水石窟始凿于5世纪,其中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无量寿佛龕有420年题记,是中国现存窟龕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处。

③陕西区。少数窟龕开凿于6世纪,主要石窟都开凿于6世纪以后,如7世纪开凿的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山石窟,8世纪开凿的富县石泓寺石窟,11~12世纪开凿的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城台石窟等。陕西区石窟是中原北方地区晚期石窟较集中的一处。

④晋豫及其以东区。以5~6世纪北魏皇室显要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为主流,延续此主流的重要石窟有6世纪中期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和6~7世纪开凿的太原天龙山石窟。此外,5~6世纪开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绳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和7世纪初开凿的安阳宝山石窟,也都与上述这批主流石窟有密切关系。晋豫及其以东地区石窟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

具体过程,因此,这个地区石窟在全国石窟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区开凿较晚的石窟,还有6~8世纪开凿的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11世纪开凿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13~14世纪开凿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窟石窟和15~16世纪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

中原北方石窟中,河西和甘宁黄河以东两区多塑像壁画,陕西、晋豫及其以东两区多雕刻。4区除个别石窟外,多杂有摩崖龕像。中原北方窟龕的发展演变,大体可区分为4大期:

第一期即5~6世纪,是这个地区开凿石窟的盛期。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也有少数禅窟和禅窟群。主要造像有三世佛、释迦、交脚弥勒、释迦多宝对坐像、千佛和思惟像,其次有本生、佛传和维摩文殊对坐像。七佛、无量寿(阿弥陀)、倚坐弥勒和观世音、骑象的普贤等出现较晚。

第二期即7~8世纪,主要盛行佛殿窟、大像窟,较晚出现佛坛窟。除释迦造像外,阿弥陀、弥勒、药师等净土图像和观世音像逐渐复杂起来,出现了地藏像,密教形象也开始盛行。

第三期即9~10世纪,石窟开凿渐趋衰落。石窟形制摹拟地上佛殿的情况日益显著,佛坛后面凿出了背屏,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作法开始流行。窟内壁画盛行排列多种经变的新形式。佛龕两侧流行文殊、普贤相对的布局。文殊似乎受到更多的重视,敦煌莫高窟和富县石泓寺石窟都出现了“文殊窟”。对观世音的崇奉更为普遍,许多地点出现了观世音的各种变相。天王的形象也在这个阶段逐渐盛行。

第四期即自11世纪以后,开凿石窟的地点愈来愈少。造像题材除前期习见者外,罗汉群像逐渐盛行,还出现了罗汉群像与佛传结合的局面。出现了布袋和尚。儒释道合流的形象也在石窟中出现,庆阳平定川石窟中1095年雕造的“三教诸佛”,是现知中原北方地区这类题材的最早实例。13世纪太原龙山开凿了全真道教石窟。13~14世纪莫高窟、榆林窟开凿了藏传密教的“秘密堂”。16世纪初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出现了水陆道场的连续浮雕,这里有的洞窟内外全部雕出了仿木结构。石窟摹拟地上佛殿的作法,年代愈晚愈突出。

南方地区 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布局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龕像多于开凿洞窟。凿于5~7世纪之际的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新昌刻溪大佛,原都前接木构殿阁。广元一带6世纪的石窟,形制多属佛殿窟,有少量的塔庙窟。这时期的主要造像除释迦外,多无量寿(阿弥陀)和弥勒倚坐像,还有释迦多宝对坐像。自8世纪以后,四川岷江、嘉陵江流域诸窟龕盛行倚坐弥勒、净土变相和各种观世音造像。10~11世纪多雕地藏和罗汉群像。11世纪大足石篆山出现了最早的儒释道三教石窟。12世纪大足大佛湾造像内容更为庞杂,除佛传、经变、观世音等形象外,还有祖

师像和藏传密教形象。杭州西湖沿岸的窟龕开凿于10~14世纪,13世纪末以前多雕阿弥陀、观世音和罗汉像,13世纪以后多雕藏传密教形象。开凿于9~13世纪的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都是佛殿窟,9世纪主要造像有弥勒和阿弥陀,10世纪以后主要造像有观世音、毗沙门天王和密教的八大明王,最具地方特色的是以南诏王及其眷属为主像的窟龕。

西藏地区 西藏地区石窟多不具造像的僧房窟和禅窟。摩崖龕像分布较广,题材多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附刻六字真言。以上窟像的雕凿时间,大都在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所谓的后弘期。拉萨药王山是西藏窟龕较集中的一处:山南侧密布摩崖龕像;东麓的查拉修甫石窟,是现知西藏唯一的一座吐蕃时期开凿的塔庙窟,塔柱四面各开一坐佛龕,窟壁雕像多后世补镌,该窟右上方凿出附有石床的僧房窟。

上述4个地区的石窟寺虽各具特点,但又互相影响。5世纪60年代云冈最初开凿的大像窟——昙曜五窟应和新疆古龟兹石窟有一定的关系;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塑绘,也受到了新疆的影响。5世纪晚期,南方造像明显地影响了中原北方,江南无量寿佛的崇奉传播到中原西部的时间,可能更早。6世纪中期以后,中原西部的石窟龕像又影响到四川北部。7~8世纪的隋唐盛世,中原窟龕典型所在——各种净土变和密教形象已南遍四川,西及新疆。11世纪以后,罗汉群像既盛于中原北方,也流行于江南。13~14世纪西藏藏传密教形象不仅出现在中原北方,还出现在南方。在以上各地区相互影响的复杂现象中,可以看出: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受到新疆的影响,这显然是和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布的情况有关;自5世纪晚期以来,佛教窟龕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后,中国各地石窟龕像的发展演变,尽管都还具有地方特征,但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全国主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所盛行的内容的影响。这一点,与中国考古学其他方面的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大体一致的。

二、新疆地区石窟概述

拜城克孜尔石窟

第一节 引言

佛教在印度产生之后，随着其自身发展的进程，不断向印度本土以外的周边邻国传播扩散。北传佛教经由中亚，翻越葱岭进入现在的新疆地区。并以这里为中转站，沿丝绸之路向东挺进，扩展到中国辽阔的中原地区。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大约在两汉之际，中原地区对来自异域的佛教已有所了解。此后，随着频频东来僧侣们锲而不舍的努力，加之中国封建统治者意识到这种异国宗教可以用于“敷导民俗”，从而大力提倡和扶植，使佛教终于在这块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异国他乡，扎下了根。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其蔓延、传播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行抗争与融合，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佛教寺院、佛教石窟和其它佛教艺术品，伴随佛教的传播也应运而生。保存至今的佛教遗迹和遗物，成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而佛教石窟在佛教遗迹中，又以其特有的艺术风貌和丰富的遗存，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石窟遗迹，地域分布之广，保存数量之多，绵延时间之长，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从西北边陲的新疆到黄河流域，从长城内外到长江上游和下游地区，都有规模不等的石窟。其中规模较大的石窟群，已有30多个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号称中国石窟之冠的敦煌莫高窟，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佛教石窟在古代文化遗产中的地位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新疆石窟，在中国石窟中又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因而引起国内外学者的特别兴趣与关注。新疆石窟主要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地区，丝绸之路北道沿线的绿洲。西起古代之疏勒（今喀什一带），经龟兹（今库车一带）到高昌（今吐鲁番一带），都有石窟和寺院遗迹。又以龟兹境内之石窟遗迹最为集中。数量多、规模大，开凿延续时间也长，并具有浓郁、鲜明的地方特色。研究和了解新疆石窟，龟兹石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

们关注的重点。

古代龟兹，在西域诸国中是个大国。东邻焉耆，西接疏勒，控制着丝路北道中段沿线的大面积土地。龟兹物产丰富，矿产以铁最为著名，所产铁器行销西域各地，“恒充三十六国”。锋利优质的铁器，是开凿石窟不可缺少的工具。显然，龟兹生产的充足的铁工具，为龟兹大规模开凿石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龟兹文化中，尤以乐舞最负盛名，《大唐西域记》即称它“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龟兹乐传入内地后，曾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佛教传入龟兹之后，很快发展起来，在千余年中，一直兴盛不衰。直到伊斯兰教势力进入新疆地区，佛教才逐渐衰落、消亡。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虽然学术界的看法不完全一致，难以确断。但从汉文文献来看，公元2世纪以后，东来中土传教、译经的人士中，已有来自龟兹的僧人或居士。到4世纪时，龟兹已成为葱岭以东的一个佛教中心，僧人众多，寺庙林立。雀离大寺是龟兹的一座名刹。其遗址在库车东北面的库车河两岸，规模之壮观，令人惊叹。由此观之，龟兹佛教之传入，无疑应比中原内地略早。佛教的传入，使龟兹佛教文化随之勃兴，佛教艺术正是这一佛教文化重要内涵之一。迄今保存在龟兹境内的佛教石窟，成为我们研究龟兹佛教艺术最珍贵的实物标本和生动的形象资料。

龟兹都于今库车县。在库车附近的新和县和拜城县，和库车县一样，都保存了好几处寺院遗址和石窟。库车县境内有库木吐拉石窟、森木赛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和玛扎伯赫石窟，还有苏巴什雀离大寺遗址附近的禅窟群。拜城县境内有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和温巴什石窟。新和县境内有吐乎拉克埃肯石窟。这些石窟，规模大小不一，地理环境也略有差异，最大的窟群是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拉石窟，它们位于同一条河水的岸边。其余石窟附近，多缺乏充足的水源，规模一般较小。龟兹境内的石窟，开凿和沿袭使用的时间，并不一致。总的延续时间，几近一千年。这些石窟具体地显示了龟兹石窟特有的面貌与内涵，不难从中窥见龟兹佛教与龟兹佛教艺术发展的踪迹与特点。龟兹石窟的洞窟形制，别具特色，种类较多，类型齐备。洞窟中的壁画保存亦较丰富，绘画的艺术风格与题材内容，亦与中原石窟壁画迥异，别有情趣。

龟兹地控丝路北道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与东方和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深得地利之便，可以吸收、融合来自东、西两方面的有益影响，同时又将这种影响以自身为媒介，传向另一方。因而龟兹佛教石窟遗迹，不仅是研究龟兹历史、佛教史、艺术史的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宝库，它在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价值，也是不容低估的。中外学者对龟兹石窟产生浓厚的兴趣，就绝不仅仅是出于猎奇和纯属偶然的了。

克孜尔石窟不仅在龟兹石窟中是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在全国石窟中也可居于大型石窟的前列。它的洞窟数量多，窟形多种多样，壁画遗存丰富，题材内容和壁画的表现形

式也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当之无愧的龟兹石窟的典型代表。要研究龟兹石窟，不能不了解克孜尔石窟。

第二节 克孜尔石窟概况

1. 石窟现状

克孜尔石窟位于北纬 $41^{\circ}47'$ 、东经 $82^{\circ}27'$ 处。在库车县与拜城之间的克孜尔镇的南侧。东至库车县约70公里，西到拜城县约60公里。从库车西行，通往拜城的公路穿过克孜尔镇。小镇附近是块小小的绿洲，克孜尔河在镇西自北向南流过，汇入克孜尔石窟南侧的木扎提河。克孜尔镇东南约7公里，即被木扎提河切割成断崖的明屋达格（维吾尔语，达格即山）的南麓。从崖顶沿陡峭的山路下到谷底，便到了克孜尔石窟。明屋达格山的南麓断崖，弯成一个半圆形的弓背，两端向南延伸，与波光闪闪的河水相接，围出一块宽阔的扇形沃土。在明屋达格山的中部，流出一股小小的清泉。就是这股涓涓细流，将山崖劈成东西对峙的两段，其间便是苏格特沟。沿沟谷溯水北上，行里许，可见泉水分为两股，向西者通至山谷深处，向北者通至汨泉。两股泉水交汇处的西侧，又形成一段险峻的断崖。从苏格特沟流出的清泉，滋润、灌溉着明屋达格脚下的那片土地。它使先民和今人，在当地得以生存。

以苏格特沟为中心，将明屋达格分割成谷西、谷内、谷东几部分。克孜尔石窟的大部分洞窟，集中分布在这三个区域的峭壁上。在谷东区东端东北方的后山上，也有少量的洞窟，那里的位置和条件，都远逊于苏格特沟附近的地带。克孜尔石窟的多数洞窟，凿于崖壁的中下部，洞窟与窟前地面一般都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可以说，大多数洞窟是凌空开凿的。由于明屋达格断崖可以利用的崖面较为开阔，因而洞窟分布较为分散，远不如其他石窟那样密集、紧凑。但是在某些局部地区，洞窟又相对集中，形成若干洞窟密集的小区域。这些集中的洞窟，或是几种不同使用功能的洞窟组合在一起，或是若干洞窟在布局安排上体现某种设计意图。这些相对集中的洞窟，暗示出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苏格特沟谷口以西的区域，崖面宽敞开阔，遗存洞窟80多个，是开凿洞窟数目最多的一区。谷西区崖面下部，多堆积很厚的积土和沙石，这些堆积物有可能掩埋了一些位置偏低的洞窟，第69窟和新1窟，都是从积沙中清理出来的。近年又有新的发现。

克孜尔石窟的编号系统，我们现今使用的是1953年西北文化局组织的新疆文物调查组编定的窟号。它的编号顺序是从谷西区西端开始，向东依次编号，编至81窟。克孜尔文物保管所1973年清理出的新1窟在本区内69窟西侧。从苏格特沟谷口向北，谷内西侧、北侧和东侧诸窟属谷内区，编号为82~135窟。从谷口向东，是谷东区，编号为136~201窟。谷东区东北的后山，是为后山区，包括202~219窟和220~231窟前后两部分。232~²35窟分布在谷东区的东侧。这一编号系统，编入235个洞窟，再加新1窟，共236窟。在

谷内区北端诸窟的西部以及若干位置分散的洞窟,并未全部编入,现存洞窟的实际数目有可能接近250个或更多。

另外,国际上也有人使用德国人的编号(见篇后对照表)。严格地说,德国人并未将克孜尔石窟作全面系统的编号,只是对他们曾经进行测绘、描摹壁画、记录、拍照过的洞窟进行了命名。他们命名的洞窟不足60个,不到克孜尔洞窟总数的1/3。他们的命名,大多数是根据洞窟壁画内容的某些特征确定的,个别是按照洞窟位置与相邻洞窟的关系定名的,不能反映克孜尔石窟的全貌。没有壁画的洞窟,有壁画而他们当时未能登临的洞窟,统统被遗漏了,如谷内区的96~105窟,德国人既无命名,也无资料。德国人命名的洞窟,绝大多数都保存有精美的壁画,其中不少精品被他们切割盗走。他们在发表图片和文字记录时,是以他们的命名为据的。

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和画家韩乐然先生,在克孜尔石窟进行调查时,都对部分洞窟作了编号。因其编号不够全面,后来亦未流行使用,故不再论述。

2. 前人调查的回顾

我国学者对龟兹石窟的调查,可上溯至清代。18世纪上半叶,谢济世奉命巡察库车,他在《戎幕随笔》中,记录了库车丁谷山千佛洞,即库木吐拉石窟。其后,七十一(字椿园)在《异域琐谈》中,提到库木吐拉石窟和克孜尔杂哈石窟。19世纪初,徐松在新疆滞留期间,曾考察过库木吐拉和克孜尔石窟,两个石窟的情况,记录在他的《西域水道记》一书中。清人的记载,多为游记性质的文字,还不是科学的考察,但是他们已经注意到石窟遗迹的存在。

20世纪初以来到1949年,新疆石窟也屡见于国人游记或考察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和画家韩乐然先生的科学调查工作。

参加中国和瑞典联合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古组工作的黄文弼先生,1928~1929年在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调查时,也注意了寺院和石窟遗迹。他在后来出版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记录了焉耆的锡科沁明星、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克内什千佛洞(森木塞姆石窟)和苏巴什古城(雀离大寺遗址);拜城的特特尔千佛洞(台台尔石窟)、克子尔明屋(克孜尔石窟)等。他在克孜尔工作了16天,对140多个洞窟进行了编号,绘制了洞窟的分布情况和洞窟平面示意图,清理了部分洞窟内的堆积,发现了各种文字的文书写本、钱币等遗物,其中的汉文纪年文书,对克孜尔石窟迁变的情况,提供了可供断年的参考资料。此外,他还收集了部分剥落的壁画残块和壁面上刻划图象的拓片。在当时来讲,黄先生的调查工作,还是比较细致、比较科学的。

朝鲜族画家韩乐然先生,于1946年和1947年两次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调查。他对洞窟进行了编号、记录、清理和临摹。据调查,韩氏的编号洞窟76个。他的编号都写在洞窟壁面上。韩氏编号顺序同现行编号一致,从谷西区西端开始,向东至谷口,然后转入谷

内，再折向谷东，最后编到后山。韩氏的编号，侧重于有壁画的洞窟，对多数没有壁画的僧房窟，未予注意，没有编号。1947年他在谷西区东部清理窟前积沙时，发现了特一号窟（即今69窟），该窟壁画当时保存完好。关于韩乐然先生到克孜尔考察的起因与经过，他曾写了一段铭文，刻在第10窟主室北壁上，现转引如下：

余读德勒库克（Von—
Le Coq）著之新疆文化宝
库及英斯坦因（Sir—
Aurel Stein）著之西域
考古记，知新疆蕴藏古
代艺术品甚富，随有人
新之念。故于一九四六
年六月五日只身来此。
观其壁画琳琅满目，并
均有高尚艺术价值，为
我国各地洞庙所不及。
可惜大部墙皮被外国
考古队剥走，实为文化
上一大损失。余在此试
临油画数幅，留居十四
天。即晋关作充实准备。
翌年四月十九日，携赵
宝麟、陈天、樊国强、孙必
栋二次来此。首先编号，
计正附号洞五十五座，
而后分别临摹、研究记
录、摄影、挖掘，于六月十
九日暂告段落。为使古
代文化发扬光大，敬希
参观诸君特别爱护保
管。

韩乐然 六·十

最后于十

三号洞下，挖

出一完整洞，
计六天六十
工，壁画新奇，
编为特一号。

六·十九。

韩乐然先生，先后在克孜尔工作了两月之久。他进行了记录、拍摄照片、临摹和清理工作，工作是比较细致的。他在乘飞机返回内地时，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他所收集的各种资料和他的研究成果，未能公诸于世，实在可惜。

解放以后，新疆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得到重视和加强。1953年，西北文化局邀请专家组织新疆文物调查组，对新疆文物进行考察，同时对石窟进行了重点调查。参加石窟工作的常书鸿先生，根据当时调查资料，曾撰《新疆石窟艺术》一书，其中以较多篇幅介绍克孜尔石窟的分期、洞窟形制和壁画内容，但未刊。现行克孜尔石窟的洞窟编号，就是文物调查组编定的。

1961年，北京大学的阎文儒先生，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主持一个石窟调查组，调查全国的主要石窟。参加调查组的人员有中国佛教协会的通一法师（刘明渊）、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刘玉权、祁铎两同志。参加新疆石窟调查的还有新疆博物馆的沙比提同志。调查组在克孜尔石窟工作了较长时间。对重点洞窟，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绘制了1/100的洞窟平面图，拍摄了壁画照片。调查全部资料，存于中国佛教协会。阎文儒先生根据调查材料，对克孜尔70多个洞窟作了分期，对各期洞窟的形制特征，壁画内容和时代，作了说明和论述（《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7、8期合刊）。

70年代末以来，北京的高等院校为培养考古和美术史研究生，先后多次组织学生到新疆调查石窟，分别作了洞窟测绘、文字记录和壁画临摹等工作。1979年秋，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晁华山、许宛音、马世长和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生丁明夷四人，在宿白先生指导下，到克孜尔石窟进行了二个半月的石窟考古实习。实习组对克孜尔全部可以登临的洞窟，反复进行踏实、记录，并分别就每人的论文研究课题——洞窟形制、洞窟组合、洞窟壁画作了专题资料的收集工作。并与克孜尔文管所合作，对1~6窟、14~16窟，18~21窟，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和文字记录，为编写这组洞窟的考古报告，作了资料准备工作。这次考察特别注意了洞窟的类型和形制、洞窟之间的组合关系、洞窟之间的打破关系、洞窟重修情况、汉文题刻遗迹和壁画的题材内容等。同时在克孜尔文管所的协助下，采集了用于¹⁴C年代测定的木质、植物茎类标本。此后，北京大学还多次派人赴克孜尔石窟核对和补充资料。

70年代末，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大型系列研究图录。《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卷，日文版已由日本平凡社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宿白教授